

# 認同政治的幽靈

邱 彥 彬

在我負責觀察的其中一個場次的問答時間裡，同場的劉亮雅針對陳春燕在〈文學（中）的身份：讀邱妙津日記〉中申論的「獨一性」（singularity）概念提出她的質疑。劉亮雅一秉其深沈厚重的現實感，認為在台灣尚未真正解殖民的情況下，「獨一性」這類後現代派的主體論只是奢談。一如沈志中在〈論愛情：精神分析觀點〉中所言，「性欲力」是「聯繫人類群體關係」（109）的根本能量，因此認同政治的爭論會在以愛為主題的學術會議上重新浮上檯面，一點也不叫人意外。但在此我無能深究愛與認同之間的精神脈絡，也無意評述究竟是後殖民還是後現代比較能夠連結當下的台灣。這個發生在問答時間內的爭議，首先讓我感到好奇的是它的似曾相似。劉亮雅懇切的質疑，很難不令人回想起十五年前那一波在《中外文學》上長達二十個月（1995年2月到1996年10月）有關國族認同的大辯論。在那期間，邱貴芬曾在〈是後殖民，不是後現代：再談台灣身份／認同政治〉一文中，質疑廖朝陽的空白主體論恐有替「中國認同」預留空間、用後現代理論「為殖民者做嫁衣裳」之虞（145-46）。劉亮雅對陳春燕

---

\* 邱彥彬，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

的提問，乍看之下似乎也是在相同的脈絡下展開，這也是先前我說認同政治的爭議在這次的比較文學會議中重新浮上檯面的原因。但「重新」二字其實有失精準，恐有暗示此次的爭端有冷飯熱炒之嫌。事實並非如此。劉亮雅在表訂的時間內、但同時也在行禮如儀的學術宣讀之外所表現的嚴肅激情，在在指向這次有關認同政治的爭議不是模仿的重複，而是一次反覆的事件(event)。在這裡，我嘗試從歷史魅影的角度來觀看此一事件。簡單來說，歷史事件的重複搬演通常不是春去春又回的週期循環，也不是冷飯熱炒而已，而是過去的陰魂不散冤氣未消。這麼說，並不是試圖將回返的歷史想像成一具具對無辜的現世索求無度的惡靈。事實可能恰恰相反。若非現世的騷擾，過去早就入土為安；回返現世的過去是不得安息的幽靈，在此時此刻的召喚之下現身，而糾纏不休的目的無他，只為討回一個安頓自身的公道而已（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謂「共產主義的幽靈」或可做此解）。因此，面對認同政治幽靈的現身，我們不能只回到李登輝訪美（1995年）與第三次台海危機（1995-96年）的歷史脈絡（這等於是把過去當成惡靈），把劉亮雅的質疑視為是上世紀末的國族認同辯論一脈相承的延續。或許此時更該提問的問題是：究竟現今的台灣進入了什麼樣的治理情境，讓此時此刻成爲一個招魂幡任意飛揚的歷史片刻，迫使認同政治化爲魂兮歸來的幽靈？而在面對回返的認同政治幽靈的同時，我們又該如何回應其入土為安的要求？

有關當下台灣的治理情境，從李扁馬三任政府在治理技術上的更迭便可略知一二。粗略地說，李登輝與陳水扁主政時期的本土主義，是一項以個別主義(particularism)爲「縫合點」(*point de capiton*)來揪合國家共同體的政治工程。影響所及，社會針對認同政治發展出來的批判論述，大抵也是試圖以個別主義爲陣地而發動的霸權爭奪戰；十五年前《中外文學》的論戰或許可以放在這個框架來理解。用個別主義來扣住普同主義(universalism)

的結果，一方面有可能可以催生一個較不具壓迫性的普同主義，但也有可能固著於提喻式（*synecdochic*）的操作，賦予普同主義一個實質的個別內容而產生閉鎖的情況。面對認同政治引發的風風雨雨，今日的馬政府爲了不願走上從個別主義躍向普同主義這條曲折顛簸的道路，簡易地選擇了新自由主義的橫向移植，企圖藉此繞開認同政治的民主內戰，直接以經濟、生命等具備高度普同性的價值來作爲共同體的接合劑，試圖將所有在認同政治的場域中進行霸權爭逐的個別主義，不分你我全部安頓在經濟生命的大傘之下，以「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來包含、甚至取代「中國人」與「台灣人」，以共有生命的普同性來彌合你死我活的認同分裂，以生命格調（*life style*）的修爲與鍛鍊，來置換統獨爭議中的主體創構與霸權爭奪。

隨著治理經緯的重劃，在失去現實支撐的情況下，十五年前轟轟烈烈的論戰早已注定無法原本重抄。因此，盤旋在此次比較文學會議上的認同政治幽靈，不能說是老調重彈的結果，也不是埋首過去不願面對未來的態度使然，而是當下普同主義的招魂所致。幽靈的回訪，是對霍布斯（*Thomas Hobbes*）理論的一項反證：面對自然狀態下的爭奪殺戮，全納式的普遍主義恐怕不是解決彼此敵視的良方，也無法滿足認同政治建立共同體的根本要求，原因在於以生命法則爲本的生命治理，不僅無法結束自然狀態，更有可能在社會的織理上切開一道更難以弭平的裂痕。相較於個別主義與普同主義的閉鎖迴路，直接訴諸普同主義所導致的社會分殊可能更爲嚴重，這也是一向渴望建立普同的認同政治被迫回返當下台灣的主要原因。

之於普同主義可能的自我背叛，傅科（*Michel Foucault*）的生命政治理論提供了一個銳利的視角。透過傅科的觀點，我們可以說從李扁政權一直到馬政權，這十幾年因爲治理思維的遞嬗而遺留下來的轉折軌跡，可說是歐洲從十七世紀到法國大革命後

這一長段歷史進程的縮影（這究竟是台灣的後殖民還是後現代情況？）。傅科認為，從十七世紀開始，西方的歷史書寫或是政治運作便是以社會力量的對抗折衝為基調。從統治者的王權、被統治者的權利、乃至於歷史進行的動力、政治的算計與社會的形構，無一不是在社會戰爭的力場中誕生。直到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因為普遍化的內戰讓社會付出分裂的昂貴代價，「歷史與歷史論述」開始產生「布爾喬產生亞化」的質變，具備普同性的「生物」（the biological）與「醫療」（the medical）取代已然成為鬥爭溫床的個別主義，成為政治治理的新準則，至此，「戰爭不再是社會與政治關係存在的條件之一，而是社會要在它的政治關係中存活下去的先決條件」（Foucault 216）。傅科的描述凸顯了兩個重點。第一，在生命政治的年代，戰爭不再是構造社會與建立政治關係的內在基礎，因此政治也不是「其他延長戰爭的途徑」之一（Foucault 165），而是變成維繫既有的政治關係與社會整合的「外部」（external）條件（Foucault 216）。第二，對高舉普同主義大旗的生命治理而言不帶絲毫弭平裂痕的果效，拒絕內戰的和平主義並非堅定不移的信念，在維護政治穩定與社會和諧的大前提下，一旦威脅生命的因素出現，「內部戰爭」（internal war）還是勢所難免（Foucault 216）。

從這個觀點來看，普同主義一點也不普同。在此，傅科戳破巨靈神話的用意很明顯。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傅科的系譜描述明確點出了新內戰的雙重構造：新型態的戰爭既是在社會內部發起，但對於統合在普遍主義下的和諧社會而言，它同時又是社會的「外部」條件。既是內部又屬外部的內戰，其雙重性指向敵人在生命治理圖譜上的弔詭位置：生命治理的敵人同時位居治理的轄內與域外，敵我分界因此不在區隔內外、涇渭分明的疆界上，而是貫穿生命治理的內部。換句話說，既然統包全納式的普遍主義是生命政治奉行不渝的規臬，新內戰的目的自然不在驅逐

或殲滅內部敵人，而是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所言，將之留置在社會之內，但卻棄置於既存的政治治理與法律管轄之外，成為在普遍主義的大傘下一個失去身份標記的生命物質，一隻不會轉彎的白海豚。在生命政治的治理下，不會轉彎的白海豚已經不是白海豚。喪失身份表記的它，只剩下一團無關緊要的生命物質，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它不會被獵殺，但也不會成為保育的對象，只能赤裸裸地靜靜死去，不帶一絲一毫為了成就人類生命而犧牲自我的悲劇情調。

作為遭棄存有的隱喻，不會轉彎的白海豚以其畸零生命見證普同主義正是召喚認同政治幽靈的始作俑者。但隨著時移事往，回應認同政治幽靈框架勢必重新構築。霸權爭奪戰下個別主義與普遍主義的扣合，或許已經無法幫助我們窮究生命政治底下的去主體化現象，也無法為共同體的思考與營造提供一個有效的指引。可以取而代之的，應該是被內部界限貫穿的普遍主義與去主體化的生命物質之間的動態的權力角力。陳春燕重談儂曦（Jean-Luc Nancy）的獨一性概念，所指涉的難道不也包含生命政治治理所製造的那一坨生命物質？因為無法以同一性的身份語彙標定之，不僅屬於獨一無二、內於個人（*intra-individual*）的獨異本體，也因為去除了同一性的排他性格，而有可能成為超越個人（*trans-individual*）的共同體觸媒。劉亮雅提出的「底層人民」，難道不也是一個奠基在獨一性上的共同體構造？在論述的可述性、可見性的內在界限上，底層人民失去了身份，同時也一併擺脫了身份標定所具備的同一性與分殊性。換句話說，從論述與身份表記的象徵圖譜上消失的同時，底層人民的瘡啞身影不也現身在普遍主義的內在界限上，比官式的普遍主義更有能力創制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共同（*the common*），也比普遍主義具備更多開創新認同政治的潛能？用阿岡本的話來說，不斷滋生繁衍的生命治理機器總是要面對「某個莫以名狀的元素」（23）。這難以治理

(ungovernable)、無法以話語言說來標定的畸零生命，在此當下喚醒了認同政治的亡靈，也隱含了撫慰亡靈的潛勢。基本上，我認為劉亮雅與陳春燕的論文是以各自的理論進路，適時也適切地回應了認同政治幽靈入土為安的要求。不管是「底層人民」或是「獨一性」概念的提出，都見證了此時此刻必須回擊普同主義以安頓認同政治幽靈的迫切性。與其說劉亮雅質疑陳春燕的獨一性概念，還不如說這聲聲的質問代表了必須回應認同政治亡靈的急切。而同樣的迫切感，又何嘗不流竄於陳春燕論文的字裡行間？願死者安息！如是的禱念，我想是劉陳兩人的論文在面對認同政治的議題時共同持有的倫理態度吧！

### 引用書目

- Agamben, Giorgio. *What Is an Apparatus? and Other Essays*. Trans. David Kishik and Stefan Pedatella.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9.
- Foucault, Michel.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 沈志中。〈論愛情：精神分析觀點〉。《中外文學》40.2（2011年6月）：103-35。
- 邱貴芬。〈是後殖民，不是後現代——再談台灣身份／認同政治〉。《中外文學》23.11（1995年4月）：141-47。